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吴泰昌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吴泰昌

## 失约的家宴



# 天 地 唱

失落的歌歌歌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疏影文丛/邹海岗,王俊英主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9

ISBN 7-80074-662-3

I 疏… I. ①邹… ②王… III. ①散文—中国—当代—选集②随笔—中国—当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53 号

**失约的家宴**

(疏影文丛)

邹海岗 王俊英 主编

吴泰昌 著

---

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北方印刷厂印刷

ISBN 7-80074-662-3/I · 272

\*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32 开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0 千字

印数 1—5000 册 6 印张

定价: 9.80 元

## 题 记

这是一本写人物的散文集。写自己，写他人，写自己难抹去的感觉，写他人留下的深深的记忆。

有长有短。长达万言，短到千字。长短无妨。随意尽兴地写，该泻则泻，该收则收。

我的口胃不单调。各种风格有品味的散文，均在我吞食之中。但我追求真切、自然、质朴。

可入散文天地的题材大大小小，可使用的写法多样无穷。十多年来，我作过多方面的尝试。这里辑录的篇作，只是我已发表的少量。

不知别人怎样，我写散文时特别需要心绪的宁静。渴望那片刻的安宁！近两年写的渐少，自信情况会迅速改变。

吴泰昌

1994年6月18日于北京新源里寓所

## 目 录

|                    |       |
|--------------------|-------|
| 刻在心上的记忆.....       | (1)   |
| 想起“亭子间”.....       | (5)   |
| 海棠花开.....          | (8)   |
| 徽州道上 .....         | (10)  |
| 峨眉山人 .....         | (13)  |
| 石头弹子的故事 .....      | (16)  |
| 愿这个片刻长久 .....      | (22)  |
| 有星和无星的夜 .....      | (27)  |
| 忆念中的诗人小川 .....     | (36)  |
| 乌木雕的情思 .....       | (41)  |
| 红红的小辣椒 .....       | (46)  |
| 咸鸭蛋和松花蛋 .....      | (51)  |
| “巴金这个人.....” ..... | (63)  |
| 海棠树下的约会 .....      | (73)  |
| 听朱光潜先生闲谈 .....     | (77)  |
| 她钟爱带刺的玫瑰花 .....    | (89)  |
| 相会在月季花丛中 .....     | (92)  |
| 老师的书 .....         | (94)  |
| 梦的记忆 .....         | (98)  |
| 难忘的微笑.....         | (102) |

|                  |       |
|------------------|-------|
| 忘了时日的五天·····     | (106) |
| 鲜鱼浓汤·····        | (109) |
| 燕园的黄昏·····       | (114) |
| 飘浮在眼前的那片白云·····  | (119) |
| 紧含眼中的泪·····      | (123) |
| 致红场卖画女郎·····     | (131) |
| 关于《梦的记忆》的记忆····· | (134) |
| 秋天里的钱钟书·····     | (137) |
| 冬日访冰心·····       | (143) |
| 在意大利寻觅·····      | (145) |
| 笔健·····          | (152) |
| 憾事·····          | (154) |
| 我的戒烟·····        | (157) |
| 真情·····          | (162) |
| 交往不该累·····       | (164) |
| 妙愿难成·····        | (167) |
| 我爱吃家乡的鱼·····     | (169) |
| 又是冬天·····        | (171) |
| 未厌居里说“未厌”·····   | (173) |
| 渴望那片刻的安宁·····    | (176) |
| 失约的家宴·····       | (178) |

## 刻在心上的记忆

多雨的江南之春。在上海一个偶然的场合，我听到了茅公长逝的噩耗。那是在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的家里，时间是三月二十七日下午三时二十五分，电话铃突然响了，主人的女儿习惯地拿起电话，当她脸色大变，失声喊出“茅公”时，一切都毋须说明了。主人披着上衣急忙地走去接电话，只见他十分艰难地、一句一顿地说：“很吃惊，很难过，他是我尊敬的老师，几十年如此。……”浓重的有四川乡音传出的是难以言说的深挚悲痛的感情。

我又想起一个多月前，在我江南之行的前夕，我去北大看望一位病中的老师，闲谈起茅公近年发表的文学回忆录，这位年已七十的老教授感激地说：“三十年代我的两个短篇集子刚出版，茅公就写文章评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给予我很大鼓励。几十年来，我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良师。”

这两位长者，在文学领域中都有卓著的成绩，有的称得上是杰出的语言艺术大师，他们都忘怀不了当年茅公所曾给予他们的支持。人

们不难想象，在茅公活动于中国现代文坛上的漫长六十年中，对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他都给予了多少滋润生机的雨露。

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偶有机会，向茅公求教。虽然他已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了。身不好，尤其是冬天，说话就气喘得厉害。但每次对于我们这些后辈的请求，有时甚至是过份的请求，都尽可能给以满足。前两年在他前院小会客室里，后来在他后院书房里，他总是静静地听我们谈，然后慢慢地解说，微笑里透露出慈爱与激励，在这种亲切平易之中又满涵着一位真正的长者严格的要求。

一九七七年秋末，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是被迫停顿了十几年后作家们第一次自由探讨创作问题的会议。大家高兴地听了茅公的讲话。讲话稿整理出来后，题名《老兵的希望》，《光明日报》要先发，茅公招呼校样他还想看看。送去后他当即看了，只改动了几处。临走时，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开玩笑地说：讲话稿不如写文章文字那样推敲，整理时可以去掉一些可有可无的虚词，尽量精练些，这项工作你们编辑应该做。晚上，我仔细琢磨他的改动，很有收益，夜凉了，还感到他的手留下的余温。

第四次文代会的开幕词是茅公作的。他因身体原因，要大会筹备组先代他草拟一份稿子。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冯牧同志和张僖同志叫茅溪同志和我去茅公家，听取他对开幕词草稿的意见。下午三时半按约见到他。那天他精神尚好，翻了几页铅印稿，说四千字长了，有一千多字就可以了。他说有些问题在别的报告里要讲到，创作问题他又另有一个发言。因此茅公说他要亲自动笔，叫我们将稿子留下，明天上午十一时后再去取。次日十时半我们提前去时，他已将稿子改定。可见他是忙了一夜。他翻着删改后的稿子给我们看，一一说明为什么这段

要删，哪几句要加。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精神使我们感动不已。他还说：写这类文章要干净、简短，重点突出，切忌面面俱到，同时要有个性，表达方式和语气要力求符合讲话人的习惯。

茅公的谈话，哪怕是三言两语的插话，也很富有思想和启发。七九年九月十一日下午，我有事去茅公家，顺便请教他关于柳亚子诗词的评价问题。七八年夏天，我业余读了一点柳亚子诗词，为《中国现代文艺研究丛刊》写了一篇浅显的文章：《谈柳亚子的诗》，自己深感我们过去对柳诗的研究不够，但究竟应该怎样适度地评价拿不准。我很想听听茅公的高见，接受他的指点。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反问我的看法。茅公说：柳亚子的旧体诗词成就很高，史料价值也大，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够，他说有机会他要谈谈这个问题。不久他在第四次文代会期间的一次讲话中，公开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柳亚子是前清末到解放后这一时期内在旧体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柳亚子的诗、词反映了前清末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一长时期的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符其实的。”茅公从文学史实出发引出的这个新鲜见解，为许多现代文学研究者所赞同。茅公在学术上的这种勇气，直到他搁笔之前写的一些短文中还充沛地葆有。去年十一月二日上午，我随罗荪同志去茅公家，请他为即将改刊的《文艺报》写稿。据茅公的亲属说，他正全力以赴埋头撰写文学回忆录（那时正写到一九三三年），其它文章一般不写。当他知道《文艺报》明年起将改为半月刊，慨然允诺了（我心里想，茅公一定还清楚地记得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他负责筹备创刊《文艺报》的情景），并且很快写成了。这就是文艺报今年第一期发表的茅公的《梦回琐记》。在这篇札记式的短文里，茅公针对目前已出版的几部现代文学史，建议

文学史编写采取另一种体例。从文前的小引得知，这则札记写于清晨，是他“神智清醒，偶有所思”之作。

最近几年，茅公深居简出，但他仍关心当前文艺创作的发展。《文艺报》纪念建国三十周年时，曾请他写过一篇《温故以知新》，这篇短文概述了三十年来我国文艺发展的历程，又结合当时文艺界有争议的若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今天看来，也都是中肯的。如他认为“伤痕文学”的兴起是有特殊的社会根源的，这类作品能起到一定的社会作用，但它“不能止步不前，必须向前发展。这不是指量的方面，而是指质的方面。对作品的题材，还应该发掘得更深，还应该加强作品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表现的更完善。同时，也要想到已有的‘伤痕’题材会越用越少，那就得做好准备，转换题材”。茅公在谈话时，殷切希望搞文艺理论批评的同志多阅读些当前的文艺作品，努力运用唯物辩证观点去分析作品和文学现象，他说这样产生的理论批评才会是活泼的，有生气的，作家和读者爱看的。茅公解放后写了大量评介青年作者及其作品的文章，他的评论文章就具有这样的活泼的风格。一九七八年前后，他曾想继续写些短篇小说漫评一类文章，并要《人民文学》编辑部帮他提供一些优秀短篇小说的题目，大概由于他的视力和精力所限，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兑现，这个损失是永远不可弥补的啊！

今天下午隆重的追悼会上，有多少老年的、中年的和青年的作家，踏着哀乐，默默地走向茅公的遗像，向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献上自己心灵的哀歌。茅公那双同情、激励的眼光像往常一样在亲切地看望着我们，叮嘱着我们，不要悲伤，要有信心和力量，“新一代肯定将超过他们的前辈，同时也将被下一代所超过”。

1981年4月11日夜

## 想起“亭子间”

上海的亭子间是很小很小的，这是儿时的印象。后来长大了，阅看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才知道亭子间的“小”里藏着许多神奇动人的故事和人生的逼真图画。二十多年前，我从江南水乡来到北京求学，日见大楼矗立，马路加宽，古城的变化，几乎将我童年的记忆冲到不知什么角落去了。

但是，记忆是潜藏着的，有时难以捕捉它，有时它却不知不觉间突然蹦出来，并慢慢地展开去，以至淹没了你的脑际。

那是一九七七年秋天，一天清晨，我应约去西郊探望一位知名的老作家。

他住在被叫作“宇宙红”的住宅区。楼号忘了，快近楼群时，我问了几位年轻的过路人：“请问周立波同志住在几号楼？”回答是不假思索的一个摇头动作，或者用眼睛冷漠地打量一下我，便径直走了。他们对被询问者的名字如此生疏，令人吃惊。然而，无巧不成书，当我正焦急窘迫的当儿，他忽然从小道的那头悠闲地走过来了。

他是我尊敬的人，从中学起我主爱读他的作品。前些年听到过他的悲惨遭遇。他从外地来京养病不久。当我走到他的面前，他仰起那副高度近视眼镜，微笑着说：“这么早你就来了？我在附近走走，一块回家去吧！”我跟着他进入了附近的一个楼门，二层，左边。他说的“家”，我原以为是一个宽绰的住宅哩，可是，一踏进……不知怎的，顿然使我想起了儿时见过的亭子间，又想起曾读过的一本名叫《亭子间里》的书，因为再现在我眼前的，是一间不超过十平方米的小屋，这是他的卧室、书房兼会客室，家里人住在另一小间。厨房在进门的过道口，厕所在门外楼道里，公用。这种简易楼，对北京大多数居民来说，是不陌生的。当我坐定，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亭子间”三个字时，他反应很快，忙解释说，那是他的一本旧著，收了一些有关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是在上海亭子间里写的，为了纪念那段生活，取了这个名字，谁知遭厄运，前几年“亭子间文学”被说成是“黑文学”，被批得好厉害！……我没有记住他说的其他话，我感到呼吸的压迫。那天原是去约稿的，结果正经事没有谈多少。这个小屋的狭窄憋得人难受，我耳畔不断响着“亭子间”这三个字。

过了些日子，《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了一次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的住所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庭院，幽静、舒适。为了便于吃汤药，他坚持晚上回去。早上我去接他。知道他夜间或凌晨常写作。那时他除了要应付报刊的一些零星约稿，正在酝酿写一部战争岁月的回忆录，他保存了好些当年的日记、笔记。有次见他坐在“亭子间”里翻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重版的《暴风骤雨》，神情那么专注，我真想透过他的眼神——“心灵之窗”，窥望他此刻的心海，是平静的湖面，还是席卷的怒涛？

一九七八年夏天，他在西苑饭店参加文联全委扩大会，因

工作关系，多次见到他。一次他谈起他很熟的一位“左联”时期的亡友，当得知我正在编辑一部他这位亡友的集子时，他深情地说：他文章写得快、好读，多是在亭子间里连夜赶写出来的。他说要写一篇纪念文章，缅怀亭子间时期的生活、友谊。——又是“亭子间”，我不禁怅惘了。

后来，他患肺癌住院了。在他住院治病期间，住宿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临死前，他终于向“亭子间”告别了。这个变化，对他来说，已不是现实的存在。他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每当乘电车路过西郊时，我总爱透过车窗，注视那个熟悉的方向，寻找绿树丛中那幢熟悉的楼房。今夜，秋雨淅沥，立波同志在《亭子间》后记中的这几句话使我思绪绵绵：“亭子间开间很小，租金不高，是革命者、小职工和穷文人惯于居住的地方。我在上海十年间，除开两年多是在上海和苏州的监狱里以外，其余年月全就是在这种亭子间里度过的。在亭子间里，我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稍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又参与了左联的党团的活动，担任过两种刊物的编辑。”像他这样蜚声海内外文坛，与“亭子间”结下了不解之缘的大作家，为什么能够锲而不舍，奋笔如椽，向人民奉献丰盛的精神产品呢？他一生笔耕，面对困难，甘之如饴，却长期困于“亭子间”里，这是为什么呢？三十年代不得已困于“亭子间”，后来听从号召，走出了“亭子间”，又被重新投入“亭子间”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太发人深思了！

有幸的是，他瞑目前，终于搬出了“亭子间”。四个现代化的曙光，开始照拂到人们身上，也照拂到了这位驰骋文场一生、成就卓著的老将身上。我们是有希望的。虽然这只是衣食住行的小事。

当我路过西郊的时候……

## 海棠花开

我每天上班，骑自行车快行半小时。我常跑的一条道，心中的一条自然线，是从叶圣陶老先生住的那条僻静的胡同里穿过。有些日子，我就利用上班或下班的间隙，踏进叶老家那座古老的四合院，直奔后进。先见到叶老的长子叶至善，每次总能得到一杯新沏的热茶。主人说明，茶叶是家乡捎来的，颜色碧绿，像我从小喝惯的那样。常有的情况，正当我们攀谈得情意浓厚时，叶老听到了客堂的谈话声，便慢步从西耳房的卧室里踱了出来，右耳戴着助听器，或者站在一旁听，或是参加谈论。所以这几年，我常有机会受到这位八旬老人富有哲理的教诲以及在写作编辑工作方面的精辟的指点。叶老的谈话耐咀嚼，而又风趣横生。听着他那洪亮的声音，望着他那十分浓厚的银白色的须眉，常常引起我奇怪的联想：在学生时代读叶老的作品，我那时就想象过作者应该是这样恳切的一位老人。作家用蘸着自己的情感的色彩的笔，将读者带到艺术的天地中去。而读者在读作品时，往往通过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来

认识作家、在内心塑造作家本人的形象。也许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吧！

北方的春天到得晚，要四月才真的暖和起来。这是老年人作户外活动的好季节，叶老也开始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院子东北角上的那棵有了年头的海棠树发绿了，开花了。八年前，叶老与四位幼年时代的朋友约定，每年四月十九日在家里小聚，观赏盛开的海棠花。这四位老友是王伯祥、章元善、顾颉刚、俞平伯，王、顾两位已经作古了，去年在海棠花下聚会只剩了三老。近几年来，不少老朋友相继去世，叶老固然怀念他们，但是对于这自然的规律，他并不忌讳。有人祝贺他长寿，说他一定能活到一百岁。他总是笑着说：“今后的事情，我没法谦虚，只好看吧。”可是我总有这样一个愿望，能够年复一年，看到叶老的白于霜雪的须眉，与一丛丛光彩熠熠的海棠花叠印在一起，我也能够年复一年，坐在叶老跟前，静听他的教诲。

以前春节家人要团聚，亲友要往来，因为过完节，为了各谋生计，许多人又要四出奔波。叶老说，十七八岁的人就要挑起生活的重担。他自己就因为家境贫寒，中学毕业后无法升学，一九一二年春节过后就当小学教员了。数年后，又是过了春节，他和吴宾若、王伯祥一同搭乘航船去苏州乡下古镇角直的一所小学任教。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八二年，整整七十年。常言道，人生七十古来稀，而叶老从事教育事业就经历了整整七十年，在我国的教育史上是很少有的。

1982年2月

## 徽州道上

傍晚必须赶到屯溪。主人刚沏的新茶喝了二道，还那么青绿，就不得不停杯启程了。皖南晴雨不定，早上还是大晴天，这会儿变脸，下起雨来。离开家乡近三十年了，北方的干燥却不曾使我忘掉家乡雨丝的记忆。中学时，每当春秋远足郊游，最怕的就是阴雨天，晚上睡觉也不踏实，担心屋檐的滴答声。那时我尚未尝过失眠的滋味，一觉睡到天亮，心里有事，四五更时会自然醒来，揉着惺忪的眼睛到天井里去望天空。多少次登太白楼、爬翠螺山的兴致，被这讨厌的雨丝抹掉了。

早起听广播，说江面有六七级大风。多年不曾有过的怕雨的心情又潜上心头。昨天与那沙同志约好，上午他从合肥到芜湖，我跟他的车一道去屯溪，我们要参加的座谈会明天开始。这么大的风，轮渡能照常开吗？二十年前有次我从裕溪口过江，赶上大风，轮渡停摆，只好伫立江边，眼望长江浪涛中点点风帆颠簸远去，恨不得一脚跨过江南，去亲吻那令人依恋的青山绿水。现在可不同了。这点风算什么？十时

半那沙同志准时过江了。我们从芜湖出发时，漫天的急雨突然驻脚，天空明亮起来，将这座江城涤净一新。

我平日自称是皖南人，不说黄山，连皖南山区还未去过，那沙同志是广东人，在安徽工作多年，皖南山道跑熟了。沿途稍大一点的集镇，多半能说出它们的名字，有时还能长长短短谈些有关的风俗人情的趣话。

中午到了宣城，李白的足迹到过这里，光凭这点，就使这座古城遐迩闻名。友人请我们尝新，泡了本地出产的敬亭碧雪。据说，这茶近年很为中外茶客称道，颇有与皖南名茶太平猴魁、黄山毛峰争势的劲头。我从小随大人养成喝茶的习惯，现在每天至少要换二杯。说实话，无非是驴饮，哪里知道喝茶还有许多讲究，什么粗茶细喝，细茶粗喝，好茶的水冲出来是清的，次茶的水冲出来是浑的。我端起自带的茶杯（玻璃罐头瓶），茶水明净，透过浮动的新芽嫩叶，能清晰地看到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人。他是我三十年前的语文教师，现在这里的一所中学教书。

这是我今天在途中最意外的收获了。年岁渐渐增大，有时出其不意地在他乡会遇上故人，交谈几句，情感也会被少年往事所牵动。今天不一样。他是熏陶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一九五四年大水退潮之后，他被调到江北工作远行时，我们一群十六七岁的伙伴，曾在两岸葱绿的长堤上送别过他。五七年他因发表一篇文章遭受厄运多年，曾被放逐泾县老家务农，据说自学行医，成了附近一带有名气的郎中。前两年才彻底平反，重返教育岗位。我细细端详他，虽然他老了，却依旧那么干瘦，有精神；当谈起他的近况时，他习惯地做了一个为我异常熟悉的手势，说：现在还好。“还好”。这就好了。至其它原该探问的一切，我都不敢去触动它。我尊敬地递给他一支香烟，他随手接过，我划亮了火柴……